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与路径机制

况嘉欣，郭耀辉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与农村经济研究所，成都 610066）

摘要：基于2011—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对于中国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发现新质生产力对于共同富裕中的“共享度”并未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中介机制检验发现，劳动报酬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够间接推动共同富裕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新质生产力对于不同水平下的共同富裕影响程度不同，虽整体正向显著，但对于中低水平的共同富裕影响最大；空间异质性分析发现新质生产力对于东、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其中中部地区影响最大。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共同富裕；中介机制检验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26)06－0270－10

在新时代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新质生产力已成为驱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力量。新质生产力是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共同作用下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其基本内涵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核心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鲜明特点为创新，关键在于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解构新质生产力，需要从“新”和“质”两方面分析：“新”主要表现为以创新为主导，依托新技术、新要素以及新产业，形成先进的生产力形态[1]；“质”则强调以科技创新为内在动力，标志着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大幅提升，是更契合新时代发展需求、充分体现高质量发展内涵且高度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2]。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完成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然而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转化，数字鸿沟、劳动保障、平台垄断、产业发展已然成为新质生产力推动共同富裕发展需要面临的新的现实困境[3]。因此，寻求关键技术突破、探索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新质生产力无疑成为推动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之一。

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而新质生产力则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中国的创新性实践。生产关系适应社会生产水平时，会促进社会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社会发展。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社会生产力的高级体现，实现共同富裕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4]。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与阶段，新质生产力以“技术-要素-产业”筑牢共同富裕基础。新质生产力中的颠覆性技术突破有利于促进技术成果转化，提升产业价值，从而推动物质富裕；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有利于通过要素识别管控，促进产业创新开发，为精神文化产品的供给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从而促进精神富裕；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有助于弥合区域、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进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5]，推动国民经济迈向协调、高质量发展轨道。因此，厘清新质生产力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内在关联，精准剖析新质生产力作用于共同富裕的核心机理，是赋能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

目前国内外针对共同富裕的研究主要涵盖理论内涵界定和实践路径两大类：中国的共同富裕是富裕的共享，也是共享的富裕，是“富裕”和“共同”的有机统一，需要人民群众在参与共建共享的过程中达到的富裕社会[6]。学者们在解构共同富裕的内

收稿日期：2025-08-06

基金项目：四川省农业科学院1＋9科技攻关项目(1＋9KJGG00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3XJY006)；四川科技计划(2023JDR0349)

作者简介：况嘉欣(1997—)，女，四川绵阳人，硕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通信作者郭耀辉(1985—)，男，山西吕梁人，硕士，高级农艺师，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

涵同时,提出了当前中国共同富裕还存在区域差距有待弥合[7-8]、收入和财产差距过大[9]、中等收入人群占比较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较低[10-11]等问题。在实践路径方面,多数学者从宏观视角不同维度探讨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12-13]、收入分配[14]、数字经济发展[15-16]、数字普惠金融发展[17]等,结果发现虽然以上视角都能总体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但都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此外,还有一部分学者从实证方面测度了近年来中国共同富裕发展指数[18-19]和对部分空间分异性进行研究[20-21]。

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不仅体现在生产力数量上的提高,更重要的是生产力"质"的变革:以技术创新为主导、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标志、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载体的先进生产力[22-23]。因此,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也是发展质量的提高过程。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解构新质生产力的要素特质[24]、功能取向[25-26]和结构承载[27]:学者们从"要素-结构-功能"的维度解构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可以引发以"智能化、绿色化"为主要趋势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的"质"的变化;通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来改善现有生产力系统的结构;通过以上二者带来的生产能力的提升和效率改善,体现新质生产力的功能。也有学者从新质生产力"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内涵定义构建指标体系进行指数的测算[28-29],结果发现区域内新质生产力水平都呈整体上升、区域异质性明显的特征,且东部区域明显高于其他区域。此外,学者们还发现通过数字经济产业集聚[30-31]、要素融合[32-33]、绿色发展[34]等角度能够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当前学界关于新质生产力与共同富裕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理论机制以及要素赋能方面[35-36],针对二者之间作用机制的探讨相对匮乏,且实证研究较为稀缺。本文基于2011—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产生的影响效应展开实证分析。其边际贡献在于:丰富共同富裕指数测度维度,以期提供更为准确的共同富裕指数,并且分别从"物质富裕""精神富裕""区域均衡""城乡均衡"细分角度探讨其影响效应;构建产业结构升级和劳动力结构升级两个机制变量,探讨了二者对于推进共同富裕发展的内在机制和传导路径,丰富共同富裕实践路径方面的实证研究;从水平、空间等角度检验新质生产力影响效应的异质性,为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提供理论依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直接影响

共同富裕的"富裕性"和"共享性"分别强调了更高效的生产力和更公正合理的生产关系[37]。二者的结合,一方面要求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智能化生产,促进生产力的提升;另一方面要求新型生产关系更加注重公正性,实现与新质生产力的相互协调,有机地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成果。它源于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以创新为显著特征,本质上属于先进生产力的范畴[38]。在当前智能时代的科技变革浪潮中,表现出多领域技术迸发且相互融合的创新模式,在社会经济领域引发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方面,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为代表的前沿技术深度融合,促使传统产业边界不断模糊,催生诸如智能制造、智慧物流等新兴业态,改变了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分布格局。高技能人才在新兴产业中的需求大幅增加,推动了社会劳动力结构向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变,进而重塑社会阶层结构,为不同阶层人群提供新的流动渠道和发展机遇,这在深层次上影响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架构。在消费模式领域,借助大数据分析消费者偏好,人工智能实现精准营销与个性化推荐,电子商务平台与移动支付技术的无缝对接,极大地提升了消费的便捷性与个性化程度。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标准化产品与服务,而是追求定制化、智能化的消费体验,进一步拓展了消费市场的深度与广度,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成为共同富裕进程中消费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此外,新质生产力在协调多方发展,缩小空间差距、贫富差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质生产力是以新型生产关系和创新性制度为保障的生产力。这意味着新质生产力通过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优化要素流动布局,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新契机,通过跨区域技术合作和共享技术成果,产业集聚、参与分配,优化产业布局,数字转型、价值提升等方式缩小区域差距。通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体系建设,缩小城乡发展差距[39]。此外,新质生产力具有技术含量高、交叉属性强,扩散性、渗透性、融合性等特征[40],可以极大拓宽不同收入群体参与经济发展、共享成果的渠道和途径,弥补技术

创新带来的机会鸿沟，助推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转化。综上，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1.2 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影响的传导机制

新质生产力通过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引发产业变革，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进而实现降本提质增效，带来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41]。此外，在生产、交换等领域呈现越来越深入的科技渗透特征，标志着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性重塑。其中，产业结构升级、劳动报酬提升等因素都会为推动共同富裕做出重要贡献。

1.2.1 新质生产力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具有变革性的生产能力，正以其独特的运行逻辑重塑产业结构，进而对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契合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技术创新不断打破原有的均衡，催生新的产业形态。这些新兴产业凭借其高附加值、高增长潜力的特征，在产业结构中占比逐渐增大，促使产业结构从以往依赖大量劳动力与资源投入的传统模式，向侧重技术研发与知识积累的新模式转变升级。这一过程符合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即随着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级化、合理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是基于不同生产要素与生产资料有机融合形成的，加强了劳动者、企业之间的协作能力；新型生产工具与新型劳动者促使产业融合更加高效[42]，促进了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各地区立足功能定位与发展实际，在空间上形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区域经济发展布局，从而缩小区域差距，推进了共同富裕。综上，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a：新质生产力会通过优化产业结构，进而对共同富裕产生积极影响。

1.2.2 新质生产力的劳动力结构升级效应

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大量高质量就业岗位，不同层次的人才凭借自身知识和技能在新兴产业中获得相应的回报，这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提升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同时，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赋能，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社会总产出。另一方面，依据内生增长理论，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通过知识和技术的外溢效应，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在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下，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创造大量高收入的就业岗位。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领域，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激增，这些人才凭借其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获得较高的薪酬回报，直接提升了这部分群体的收入水平[43]。从共同富裕的角度出发，新质生产力促进居民收入提升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随着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升级带来的就业机会增多和收入增长，不同阶层的居民都能在经济发展中受益。依据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的延伸观点，在新质生产力推动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收入分配会逐渐趋于公平，从而有力地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44]。综上，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b：新质生产力会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报酬，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支撑。

2 模型假定与数据说明

2.1 模型设定

2.1.1 基准模型

为分析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直接影响，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CP_{it} = \beta_0 + \beta_1 N_PQF_{it} + \beta_2 X_{it} + \mu_i + \delta_t + \tau_{it} \quad (1)$$

式中：CP_{it} 为第 i 个省份第 t 年的共同富裕水平；N_PQF_{it} 为第 i 个省份第 t 年的新质生产力水平；X_{it} 为其他控制变量；μ_i、δ_t 分别为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τ_{it} 为随机误差项。

2.1.2 中介机制模型

为进一步检验新质生产力-产业结构升级和劳动力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构建基准回归模型。

$$M_{it} = \alpha_0 + \alpha_1 N_PQF_{it} + \alpha_2 X_{it} + \mu_i + \delta_t + \tau_{it} \quad (2)$$

式中：M_{it} 为中介变量，表示产业结构升级和劳动力结构升级。

2.2 变量选取与说明

2.2.1 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指数(CP)

新时代的共同富裕是建立在不断发展生产力基础之上。因此借鉴刘培林等[45]的做法，在构建共同富裕测算指标时，按照“富裕度”“共同度”进行构建，同时，共同富裕中的“富裕度”不仅包含收入、财产、公共服务的物质富裕，还应当包含人们从精神层面得到的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精神富裕”纳入“富裕度”考核指标，指标构建如表1所示。本文选用熵权法赋予测度指标权重，从而计算各省份的共同富裕指数(CP)、物质富裕指数(CP1)、精神富裕指数(CP2)、城乡均衡(CP3)、区域均衡(CP4)。

2.2.2 核心解释变量:新质生产力(N_PQF)

新质生产力为传统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赋予了更新的含义,基于高新技术产业、要素融通互补等路径推进了共同富裕进程。借鉴卢江等[46]、任宇新等[47]的做法,构建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2.2.3 中介变量

(1)产业结构升级(IS_Up)。一般被看作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的吸纳和主导产业经济部门依次更迭的进程。依据干春晖等[48]的做法,产业结构的演化涵盖合理化与高级化两个方面。合理化主要衡量要素投入与产出结构之间的耦合契合程度,而高级化则展现出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的动态变迁,常被用于度量产业结构升级。本文采用产业结构高级化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状况,具体指标设定为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

(2)劳动力结构升级(Wages_Labor)。劳动报酬水平的提高是劳动力技能升级的最直接体现。现

表1 共同富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指标性质
富裕度	物质富裕	人均GDP/	万元/人	+
		GDP/就业人员数	元/人	+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人	+
		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元	+
		商品房屋平均销售价格/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
		省级最低月工资标准	元	+
	精神富裕	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
		每万人普通中小学学校数	所	+
		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	张	+
		每万人公共图书馆个数	个	+
		人均受教育年限	年	+
		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	户	+
共享度	城乡均衡	城乡人均消费支出之比	%	−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农村居民=1)	%	−
		城乡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之比/(农村居民=1)	%	−
		城乡居民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之比/(农村居民=1)	%	−
		城乡居民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之比/(农村居民=1)	%	−
	区域均衡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覆盖率	%	+
		交通通达度	年	+
		城乡恩格尔系数比	年	−
		夜间灯光数据_泰尔指数	年	−
		地方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一般预算支出	年	+
		人均预期寿命	年	+

表2 新质生产力指标构建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属性
新型劳动者	规上工业企业R&D人员全时当量	h	+
	高技术企业的研发人员数	万人/件	+
	制造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	%	+
	每万人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	−	+
新型劳动资料	机器人安装密度	%	+
	每万人专利授权量	万人/件	+
	集成电路数量	亿块	+
	人均互联网接入端口数	个	+
	软件业务收入	万元	+
	光缆线路长度/地区面积	m/m^2	+
	电子商务销售额	万元	+
新型劳动对象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产生量	%	−
	工业废水排放/国内生产总值	%	−
	工业SO_2排放量/国内生产总值	%	+
	绿色专利申请数/专利申请数	%	−

有文献倾向于选用劳动者报酬与同期同地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表示，但由于劳动者报酬自2017年各省份不再同步披露，故本文采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这一指标替代。

2.2.4 控制变量

(1)城镇化水平(U_L)。基于要素流动理论，城镇化有利于促进劳动力等要素优化配置，缩小贫富差距；同时为农民创造更多就业与增收机会，通过产业集聚，带动周边发展。采用城镇人口/当地年末常住人口衡量。

(2)对外开放水平(Open)。依据比较优势理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有利于推动就业增长，为民众带来更多收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国内企业能够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缩小贫富差距。采用货物进出口总额/地区生产总值进行衡量。

(3)税负水平(Tax)。合理的负税水平是促进居民财富增加的重要保障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也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但负税水平超过一定的限度反而会加剧“收入鸿沟”。采用税收收入/地区生产总值进行衡量。

(4)金融发展程度(Fin)。根据金融中介理论，金融发展有利于促进资源有效配置，近年来普惠金融的发展通过扶持低收入群体和小微企业，有效提升了收入水平，缩小了贫富差距[49]。然后也有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出于风险控制的原因产生金融排斥现象，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本文拟采用金融业增加值/当年国内生产总值进行衡量。

(5)环境规制(Enr)。环境规制可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带来正向的环境治理效应和经济效应[50]，在提升居民生活的幸福感等方面产生影响，最终在高质量的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但是，在应对环境规制时，中小企业可能无法进行节能减排的技术和设备更新，从而对地区的中小企业产生挤出效应，出现产业转移或企业倒闭的情况，反而使得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不利于共同富裕的均衡实现。采用能源消费量/当年国内生产总值作为指标衡量。

2.2.5 控制变量

选择2011—2022年中国各省份作为研究对象，文中所用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

基于数据的科学性和可获得性，采用双向固定面板模型用于探究新质生产力对于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表4展示了新质生产力对于共同富裕指数(CP)、物质富裕指数(CP1)、精神富裕指数(CP2)、城乡均衡(CP3)、区域均衡(CP4)的基准回归结果。

表3中列(1)报告了在考虑双向固定效应的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直接影响，估计系数为0.116并通过了1%显著性影响。说明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显著推进共同富裕进程。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每提高1%，共同富裕水平将提高0.11%，说明在考虑各地区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税负水平、金融发展程度、环境规制等影响因素差异的情况下，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仍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与理论预期一致。H1得到验证。

具体来看，新质生产力对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影响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185和0.104，并且分别顺利通过了5%和10%的显著性检验。然而，在“共享度”层面，城乡均衡和区域均衡的影响系数均未能通过检验。这一结果清晰地表明，在实验期内，新质生产力能够有力地推动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发展，但其对“共享度”的影响却较为有限。可能的原因是现阶段虽已消除绝对贫困，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共同富裕	CP	360	0.332	0.141	0.137	0.804
新质生产力	N_PQF	360	0.202	0.180	0.027	0.877
城镇化水平	U_L	360	0.601	0.121	0.350	0.896
对外开放水平	Open	360	0.271	0.281	0.008	1.464
税负水平	Tax	360	0.084	0.029	0.036	0.188
金融发展程度	Fin	360	1.864	0.784	0.181	5.587
环境规制	Enr	360	0.079	0.048	0.011	0.233
劳动力结构升级	IS_Up	360	71 773.760	28 911.660	31 302.000	212 476.000
产业结构升级	Wages_Labor	360	1.354	0.745	0.527	5.283

表 4　双向固定效应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CP	CP1	CP2	CP3	CP4
	(1)	(2)	(3)	(4)	(5)
N_PQF	0.116***	0.185**	0.104*	0.125	−0.007
	(0.019)	(0.053)	(0.024)	(0.066)	(0.080)
U_L	0.870***	1.134	2.683***	0.7000	0.342
	(0.205)	(0.631)	(0.294)	(0.571)	(0.413)
Open	0.049**	0.072	0.089*	0.027	−0.003
	(0.017)	(0.144)	(0.042)	(0.060)	(0.079)
Tax	0.010	0.023	0.000	0.033	0.012
	(0.010)	(0.352)	(0.025)	(0.055)	(0.020)
Fin	−0.143***	−0.513***	0.006	−0.010	0.034
	(0.024)	(0.043)	(0.081)	(0.048)	(0.048)
Enr	−0.122**	−0.293	−0.134	−174.000	−0.440
	(0.047)	(0.155)	(0.064)	(0.091)	(0.088)
观测值	360	360	360	360	360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R^2	0.981	0.980	0.865	0.664	0.895

注:***、**、* 分别表示 1%、5%、10%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从城乡发展角度来说,新质生产力依托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更多聚集在城市,农村地区由于基础设施薄弱和“数字鸿沟”难以同步接入。在区域发展差距方面,新质生产力主要聚集在东部沿海地区。根据《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23 年)》显示,东部地区占据了全国约 66.7%的高技术企业。而中、西部地区在人才、数据等要素方面有较明显短板。根据增长极理论,先发区域通过虹吸效应吸聚资源,形成要素壁垒,区域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共同度”提升受限。除此之外,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均能对共同富裕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发展程度和环境规制对共同富裕进程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税负水平对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影响不显著。

3.2　稳健性检验

3.2.1　缩尾处理

为提升实证结果的可靠性,运用 Winsorize 方法,对所有变量在 1%与 99%百分位进行双边缩尾处理。在此基础上重新使用基准回归模型进行测度。表 5 结果报告了缩尾后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检验结果在 1%的统计水平下仍显著为证,与原检验结果相同。表明了本文实证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3.2.2　变量滞后

通过滞后处理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考虑到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可能存在动态关联,将自变量滞后 1 或 2 期后,使用原模型重新进行估计,以检验在时间维度上核心结论是否依然保持一致。

表 5　新质生产力影响共同富裕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缩尾处理	滞后一期	滞后二期	剔除直辖市	剔除特殊年份
	(1)	(2)	(3)	(4)	(5)
N_PQF	0.117***	0.111***	0.103**	0.114***	0.097***
	(0.014)	(0.014)	(0.015)	(0.020)	(0.023)
U_L	0.756***	0.912***	0.973***	0.892***	0.916***
	(0.107)	(0.200)	(0.194)	(0.256)	(0.224)
Open	0.060***	0.053**	0.058**	0.049***	0.042*
	(0.014)	(0.016)	(0.018)	(0.017)	(0.025)
Tax	0.011	0.013	0.018	0.010	0.019**
	(0.010)	(0.104)	(0.010)	(0.010)	(0.008)
Fin	−0.178***	−0.143***	−0.142***	−0.149***	−0.096
	(0.056)	(0.020)	(0.021)	(0.024)	(0.071)
Enr	−0.120***	−0.112**	−0.110***	−0.125	−0.193*
	(0.045)	(0.039)	(0.029)	(0.083)	(0.116)
常数项	−0.646***	−0.174	−0.165	−0.769***	−0.462
	(0.155)	(0.114)	(0.092)	(0.294)	(0.391)
观测值	360	360	360	312	360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R^2	0.634	0.982	0.982	0.969	0.985

注:***、**、* 分别表示 1%、5%、10%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3.2.3　缩减样本数

考虑到直辖市在行政级别、经济结构等方面与其他省份存在显著差异,可能对估计结果产生潜在影响,故剔除 4 个直辖市样本后,重新采用相同的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表 5 列(4)结果报告的结果显示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影响仍显著为正。

3.2.4　缩减样本期

由于 2020 年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生剧烈动荡,为验证核心结论的稳健性,进一步剔除特定时段样本(2020 年及以后)采用相同模型重新进行估计。表 5 列(5)报告的结果仍与原结果符号相同。

3.3　中介机制检验

前文实证检验结果已证实新质生产力有利于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为进一步探讨新质生产力是通过何种途径推进共同富裕进程的,从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劳动力结构升级效应两个层面分析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中介效应。结果如表 6 所示,新质生产力可以显著促进劳动力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同时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影响结果仍显著为正,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表 6　新质生产力影响共同富裕的中介机制分析结果

变量	Wages_Labor	IS_Up	CP	CP
Wages_Labor			0.060**	
			(0.019)	
IS_Up				0.177**
				(0.008)
N_PQF	0.058***	0.126**	0.077*	0.113***
	(0.015)	(0.046)	(0.028)	(0.019)
U_L	0.041	0.29	0.939***	0.866***
	(0.107)	(0.447)	(0.021)	(0.200)
Open	−0.026*	0.015	0.056**	0.050**
	(0.012)	(0.086)	(0.018)	(0.017)
Tax	−0.005	−0.050	0.015	0.011
	(0.006)	(0.051)	(0.010)	(0.010)
Fin	−0.031	0.132	−0.141***	−0.146***
	(0.016)	(0.076)	(0.021)	(0.024)
Enr	−0.059***	0.220	−0.109***	−0.126*
	(0.012)	(0.116)	(0.031)	(0.047)
常数项	11.122***	0.521	−0.1545	−0.225
	(0.042)	(0.394)	(0.096)	(0.140)
观测值	360	360	360	360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R^2	0.994	0.553	0.983	0.981

注：***、**、* 分别表示 1%、5%、10%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3.3.1　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新质生产力是一种创新驱动的生产力，其以新兴技术为依托，代表着更具效率、更高质量和更强竞争力的生产力水平。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打破传统产业结构的固有格局。新质生产力往往依托于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当这些技术融入产业领域时，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一方面，新兴产业的兴起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极，增加经济总量，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优化会带动上下游产业及周边地区的协同发展，推动区域经济的均衡增长，减少区域间的发展差距。而且，产业结构的转型会引导资源的重新分配，推动社会资源从传统、落后的产业向新兴、高效的产业流动，促进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提升。新质生产力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在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 6），新质生产力每提高 1%，将有助于产业结构升级提高 0.126%，这表明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优化产业结构，假说 H2a 得到验证。

3.3.2　劳动力结构升级效应

新质生产力的内核是更强劲的创新驱动力和前沿技术的创新性突破，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需求显著增加，引发了劳动力市场供求的结构性变化，直接带动居民劳动报酬的增长。一方面，劳动报酬作为居民主要收入来源，其增长提升缩小了资本与劳动要素之间的收益差距，缓解要素分配不均导致的贫富分化，为推进共同富裕进程奠定分配基础；另一方面，劳动报酬的增长更加激励了劳动者提升技能水平，既推动生产力发展，又通过人力资本差异缩小间接缓解收入差距，为共同富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支撑。新质生产力对劳动力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在 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表 6），意味着新质生产力每提高 1%，将有助于劳动报酬提高 0.058%。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促使劳动力结构向更高级、更合理的方向转变，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力占比逐渐增加使得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议价能力得到提升，进而实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有助于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促进社会资源更加均衡分配。因此假说 H2b 得到验证。

3.4　异质性

3.4.1　水平异质性

中国共同富裕水平表现明显的空间差异特征，本文考虑新质生产力推进共同富裕的效应可能会受到因变量水平差异的影响[51]。为了更准确捕捉不同富裕水平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异质性效应，在共同富裕水平上选取 10%、25%、50%、75%、90%五个分位点，通过分位数回归检验不同水平上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果（表 7）。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在各水平上均显著为正，相对来说，对于中低水平和高水平影响最为显著，中高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小。可能存在的原因是在共同富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产业结构相对较为单一，通过引进先进技术等方式发展新质生产力时，能够打破原有发展瓶颈，实现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而中高水平的此时产业基础和经济发展水平已有一定基础，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面临的转型难度较大，带来的边际效应相对较小。故而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相对较小。

3.4.2　区位异质性

考虑到区域发展存在显著差异，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可能呈现区域异质性。本文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将样本省份划分为四大区域分区域进行回归（表 8）。结果如表 7 所示，在全国东、中、西部地区，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对东北部区域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其中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在中部影响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这表明新质生产力对于共

表 7　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影响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10%	25%	50%	75%	90%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N_PQF	0.130***	0.164***	0.098***	0.094***	0.123***	0.073***	0.144***	0.063*	−0.132
	(0.260)	(0.019)	(0.023)	(0.021)	(0.027)	(0.021)	(0.019)	(0.035)	(0.209)
U_L	0.866***	0.920***	0.900***	0.857***	0.894***	1.770***	1.540***	1.033***	3.349**
	(0.135)	(0.100)	(0.122)	(0.108)	(0.141)	(0.192)	(0.050)	(0.306)	(1.226)
Open	0.069**	0.065***	0.045*	0.050**	0.042*	−0.140**	−0.153	0.044***	0.113
	(0.020)	(0.015)	(0.018)	(0.016)	(0.021)	(0.063)	(0.157)	(0.012)	(0.097)
Tax	0.126	0.017	0.012	0.018	0.011	0.024	0.014	0.002	−0.001
	(0.016)	(0.012)	(0.014)	(0.013)	(0.016)	(0.043)	(0.024)	(0.014)	(0.031)
Fin	−0.192***	−0.180***	−0.129***	−0.151***	−0.120***	0.013	−0.153	0.064	0.004
	(0.028)	(0.021)	(0.026)	(0.022)	(0.030)	(0.737)	(0.336)	(0.090)	(0.116)
Enr	−0.080*	−0.071*	−0.121**	−0.170***	−0.122**	−0.209***	−0.016	−0.242***	0.077
	(0.040)	(0.0230)	(0.036)	(0.032)	(0.042)	(0.043)	(0.071)	(0.035)	(0.233)
观测值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360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注:***、**、* 分别表示 1%、5%、10%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 8　全国四大区域划分

区域	所包含省份
东部地区	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中部地区	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西部地区	内蒙古、广西、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东北地区	辽宁、吉林、黑龙江

同富裕的影响确实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存在空间异质性的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由于聚集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大型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产业协同度高,产业基础雄厚、市场机制成熟,科技资源优势可以通过城市群的辐射效应向周边辐射产业和技术,形成更广泛的产业集群和创新生态。中部地区相较于东部地区,在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具有明显优势,近年来得益于“中部崛起”战略,目前正处于产业结构快速调整和优化阶段,承接了大量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最为显著。西部地区相较于中部和东部地区,近年来虽然有较大发展,但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削弱了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基于 2011—2022 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新质生产力能够显著提升中国共同富裕水平。此外,对外开放水平、金融发展、环境规制也都对共同富裕的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过缩尾处理、滞后效应处理、剔除特殊样本、剔除特殊年份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稳健。

(2)通过中介机制检验发现,新质生产力除了可以直接推动中国共同富裕进程,新质生产力发展还可以通过劳动报酬升级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对共同富裕起到间接促进作用。

(3)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新质生产力对中部地区共同富裕水平提升影响最大,西部地区最小。中低端水平的共同富裕发展进程受新质生产力影响较大,中高端水平受影响较小。

4.2　建议

(1)合理配置创新资源要素,加快推进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政府发挥引导作用,对创新资源进行系统性统筹,通过搭建数字化、智能化的创新资源信息交互平台,全面掌握企业与科研机构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创新需求,精准引导创新资源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有效提升创新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催生更多高附加值的就业岗位,切实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

(2)就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言,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通过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提供专项财政补贴等多元化手段,吸引各类优质资源加速流入,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升传统产业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从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产业支撑。在提高劳动报酬方面,加快培育适应新质生产力需求的高层次人才。高等教育动态调整学科布局,紧密对接新兴产业需求,增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碳中和科

学与工程、低空技术与工程等契合科技发展与产业升级需求的前沿学科。地方政府可借鉴浙江长兴县“基金+项目+平台”模式、北京经开区“投联动”机制、新疆“兵地一体、共享公用”模式，设立满足当地新质生产力需求的专项人才发展基金，用于支持高端人才引进与本土人才培养，对投入创新人才培养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3)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凭借深厚的产业基础，具备向全球产业链高端迈进的实力，着重引导企业加大研发环节的投入，聚焦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进行技术攻关。通过打造产业创新联盟实现资源整合，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创造大量高附加值、高薪资的就业岗位，持续扩大高收入群体规模，推动共同富裕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与前人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在区域异质性分析中发现中部地区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提升效应最明显，中部地区拥有良好的工业基础，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区域，应重点开展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推动生产流程的智化数改，降低能耗的同时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同时，积极培育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提供税收优惠、土地资源支持等政策，吸引相关企业落户，带动人才回流，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基础设施与科技创新环境有待改善。在政策层面继续加大对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提升区域互联互通水平，降低物流成本。西部地区作为战略腹地，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备份。同时，充分利用当地的太阳能、风能、特色农产品等资源优势和生态优势，发展新能源产业与特色农业，并探索试点生态保护利益横向补偿机制，确保在共同富裕进程中不掉队。

参考文献

[1] 谢花林，陈彬，刘薇. 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基本逻辑、作用机理与关键路径[J]. 当代财经，2024(12)：3-15.

[2] 韩建雨，许冉. 新质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2)：1-26.

[3] 徐政，郑霖豪，丁守海. 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与策略选择[J]. 改革，2024(4)：41-49.

[4] 田超伟. 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1)：81-91.

[5] 王宇森，吴子远. 新质生产力、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协调发展[J]. 科技和产业，2025，25(12)：370-375.

[6] 李实，杨一心. 面向共同富裕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逻辑与路径选择[J]. 中国工业经济，2022(2)：27-41.

[7] 赵桑林，李哲彤，邓浩，等. 数字贸易与共同富裕：来自省域层面的证据[J]. 科技和产业，2025，25(3)：284-292.

[8] 文丰安. 新质生产力助力共同富裕：阶段性目标、困境及发展进路[J]. 北京社会科学，2024(10)：63-74.

[9] 张来明，李建伟. 促进共同富裕的内涵、战略目标与政策措施[J]. 改革，2021(9)：16-33.

[10] 何文炯. 共同富裕视角下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优化[J]. 中国人口科学，2022(1)：2-15.

[11] 李实. 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现路径选择[J]. 经济研究，2021，56(11)：4-13.

[12] 张晓杰，王桂新，李安琪. 新时代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的发展理路与创新方向——基于“价值-制度-效能”分析框架[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4，25(5)：70-84.

[13] 伏润民，缪小林，张彰，等，共同富裕目标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财政改革：基于广义国民收入的分析，经济研究，2024，59(1)：36-52.

[14] 郭阳，共同富裕背景下社会力量参与第三次分配：时代内涵、实践形态与路径省思[J]. 河南社会科学，2024，32(10)：88-96.

[15] 张文珂，张琳雪，万立全，等，数字经济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1. 南开经济研究，2024(5)：14-30.

[16] 袁涛，未加山，所丹妮，等，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基于乡村创新和乡村创业视角[J]，统计与决策，2024，40(18)：46-51.

[17] 杨秋菊，王文福. 数字普惠金融、新质生产力与城乡共同富裕[J]. 中国流通经济，2024，38(6)：115-126.

[18] 陈景华，刘展豪，曹振悦.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内涵阐释、水平测度与路径展望[J]. 华东经济管理，2024，38(10)：1-14.

[19] 孙豪，曹肖烨. 中国省域共同富裕的测度与评价[J]. 浙江社会科学，2022(6)：4-18.

[20] 钟晓华. 乡村振兴对农村共同富裕影响的空间效应检验[J]. 统计与决策，2024，40(17)：80-84.

[21] 王佳欣. 中国共同富裕水平的测度、动态演进和地区差异分析[J]. 科技和产业，2024，24(10)：47-53.

[22] 刘守英，黄彪. 从传统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4，38(4)：16-30.

[23] 周文，许凌云. 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 改革，2023(10)：1-13.

[24] 黄群慧，盛方富. 新质生产力系统：要素特质、结构承载与功能取向[J]. 改革，2024(2)：15-24.

[25] 曾立，谢鹏俊.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出场语境、功能定位与实践进路[J]. 经济纵横，2023(12)：29-37.

[26] 乔榛，徐宏鑫. 生产力历史演进中的新质生产力地位与功能[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34-43.

[27] 令小雄，谢何源，妥亮，等. 新质生产力的三重向度：时空向度、结构向度、科技向度[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5(1)：67-76.

[28] 韩文龙,张国毅. 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24,15(5):72-94.
[29] 庄定鹏,廖东声. 新质生产力:水平测算、演变格局与收敛规律[J]. 工业技术经济,2024,43(11):3-12.
[30] 罗爽,肖韵.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J]. 新疆社会科学,2024(2):29-40.
[31] 周文,叶蕾. 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4(2):17-28.
[32] 于洋,陈放,王尔大. 数据要素配置、新质生产力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J]. 统计与决策,2024,40(17):5-11.
[33] 陆敏,任潇洒,周雪含. 数实融合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机理和传导路径研究[J]. 工业技术经济,2024,43(10):32-41.
[34] 岳奎,曲秀玲. 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发展维度[J]. 当代经济研究,2024(8):15-21.
[35] 王江. 新质生产力、双循环联动与共同富裕[J]. 华东经济管理,2025,39(1):10-20.
[36] 陈晔婷,柴艺,何思源,等. 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理论机制研究[J]. 金融与经济,2024(10):62-76.
[37] 燕连福,牛刚刚. 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与推进路径[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10(2):82-90.
[38] 刘守英,黄彪. 从传统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4,38(4):16-30.
[39] 马晓河,杨祥雪. 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动实现共同富裕[J]. 改革,2023(4):1-13.
[40] 韩文龙,张国毅. 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24,15(5):72-94.
[41] 谢花林,陈彬,刘薇. 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基本逻辑、作用机理与关键路径[J]. 当代财经,2024(12):3-15.
[42] 杜传忠,疏爽,李泽浩. 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与实现路径[J]. 经济纵横,2023(12):20-28.
[43] 梁孝成,吕康银,唐志东. 共同富裕目标下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收入分配效应[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4,46(8):32-45.
[44] 邵红伟,靳涛. 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是必然还是或然——力量对比决定的一般趋势和特殊演变[J]. 经济管理,2016,38(6):176-188.
[45] 刘培林,钱滔,黄先海,等. 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J]. 管理世界,2021,37(8):117-129.
[46] 卢江,郭子昂,王煜萍. 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区域差异与提升路径[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0(3):1-1.
[47] 任宇新,吴艳,伍喆. 金融集聚、产学研合作与新质生产力[J]. 财经理论与实践,2024,45(3):27-34.
[48] 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 经济研究,2011,46(5):4-16.
[49] 汤龙,唐跃桓,杨其静. 农村电子商务、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共同富裕[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4(4):95-110.
[50] 杜敏哲,廖丽萍. 低碳转型能否促进共同富裕?——来自低碳城市试点的证据[J]. 经济学动态,2024(4):33-48.
[51] 彭刚,杨德林,朱莉. 中国城市共同富裕水平测度、空间特征与动态演进[J]. 中国软科学,2022(S1):289-303.

Impact and Path Mechanism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on Common Prosperity

KUANG Jiaxin, GUO Yaohui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and Rural Economics, Sichu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Chengdu 610066, China)

Abstract: Selecting Chines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11 to 2022, the impact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n common prosperity were empirically exam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ave a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Meanwhile, it is found that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o not have a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degree of sharing" in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the mediating mechanism test, it is discovered that the increase in labor remuneration and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can indirectly promote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impact on common prosperity at different levels. Although the overall impact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the impact is the strongest on common prosperity at the medium and low levels.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mpact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with the strongest impact in the central region.

Keywords: new productive forces; common prosperity; mediating mechanism test